

# 马克思主义人民立场的当代实践路径研究

杨晨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把人民群众放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主体位置上。随着现代化的不断推进,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历史性转化,它不仅表现在物质财富的积累上,也表现在大众对高质量生活、公平正义、精神文化等方面的诉求上。在全球化大潮和多元思想碰撞的背景下,经济波动、技术更替等多重因素交织在一起时,怎样在经济起伏、技术更替的双重压力之下坚持并践行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成为当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热点问题。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物质生产方式决定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新时代的人民立场不能只是停留在理论层面的价值宣示上,而应该转化为解决实际发展问题的制度安排和物质保障。考察价值导向向实践转化机制,实际上就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和社会发展规律的现实证明。基于当下时代特征进行剖析,人民立场在现代社会治理和经济建设中落实的状况,成为检验马克思主义真理性的关键标准,它的实践逻辑的演进,体现出时代变迁中群众实际利益诉求同国家战略布局的内在契合关系。

## 一、马克思主义人民立场的时代任务

### (一)增进民生福祉的发展诉求

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决定了生产力发展水平是满足大众物质需求的根本前提。在经济结构转型期,大众对于生存条件的期望由原来的温饱保障向更高层次的分配公平、资源共享转变。这种诉求表现在教育医疗资源的均衡分配、住房保障体系的完善、养老服务网络的全覆盖等各个方面。传统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已经不能满足大众对高质量发展的期望,随之而来的就是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带来的红利的渴望。劳动者不单关心薪酬的绝对增长,更看重劳动环境的改善、职业发展通道的畅通、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程度。资本要素在资源配置中扩张如果缺乏合理的规制,很容易造成区域间、群体间的贫富差距扩大,违背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最终要求。因此,从唯物史观的角度来看,当代大众的发展诉求是对于社会财富分配机制的优化期待,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环节中进一步突出劳动价值,通过缩小收入差距来实质性地提高整个社会的民生福祉水平。它成了当代社会发展最根本的动力,也给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完善提出了严峻的考验。

### (二)提升思想引领的价值期盼

社会存在的变化必然引起社会意识的改变。在信息技术迅速发展、媒介融合的大环境下,大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具有高度的碎片化、多元化的特征。各类非主流思潮借助数字平台得以广泛流传,于是给社会整体的价值认同造成一定冲击。在这样的现实境遇之下,大众内心对核心价值观有着强烈的渴求,希望在纷繁芜杂的信息洪流中找到清晰明确的思想坐标。这种期盼不单是对于更高质量文化产品的需要,也是对于科学理论指导现实生活、解答思想困惑的内在要求。当个体的价值观遇到利益分化带来的撕裂风险的时候,怎样形成一种有强大凝聚力的社会共识就显得更加迫切。大众需要主流意识形态以更加接地气、有说服力的方式回应他们在职场竞争、人际交往、人生规划等各方面所产生出来的精神焦虑。这种价值期待要求马克思主义理论要冲破传统抽象宏大叙事的束缚,变成可以联系普通人情感依靠和心理塑造的微观话语体系。只有填补了大众在快速变化的社会中精神信仰的空白,才能有效地防止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的渗透,建立符合时代发展走向的思想防线。

### (三)完善社会治理的制度需要

社会结构越来越复杂,利益诉求的表达渠道也有了新的重组要求。传统自上而下的单向度管理模式,在应对基层突发性公共事件、常态化社区矛盾的时候,信息传导迟缓、决策响应迟钝的弊端就暴露出来。公众对被动接受治理结果的需求减少,对参与公共事务的民主诉求变得越来越强烈。需要具体投射到对社区物业管理、公共空间利用、地方财政预算公开等基层治理微观领域的监督和决策参与上。现代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使大众要求把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变成有可操作性的制度程序。如果缺少通畅的利益协调机制和制度化的沟通渠道,社会底层的微小摩擦很容易发展成群体性矛盾。基层社会治理迫切需要从管理本位向服务本位转变,建立一个可以敏锐地捕捉并整合多元群体利益的制度架构。大众期望一种更加有韧性、包容的社会治理体系,用数字化手段破除信息壁垒,提高政务服务效率,把治理效能真正转化为百姓日常生活中安全感和获得感,这是社会秩序稳定的重要制度基础。

## 二、马克思主义人民立场的当代实践路径

### (一)筑牢物质基础厚植人民福祉

民生诉求的满足要靠现实物质基础的夯实和财富分配机制的改善来实现。从宏观上来说,必须坚定不移地推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依靠科技创新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从而创造出更多的社会总体物质财富。就具体的分配制度而言,要发挥税收调节过高收入的杠杆作用,健全转移支付制度,加大欠发达地区和困难群体的支持力度。保障和改善民生要精准发力,针对就业市场中出现的结构性矛盾,应该建立起终身职业技能培训体系,消除就业歧视,让劳动力在公平的环境里实现价值。公共服务供给上要冲破城乡户籍壁垒的束缚,促使优质的教育医疗资源向基层一线流动,创建起多元主体参加的住房租赁市场,从而减轻新市民和青年群体的居住压力。兜牢民生底线要健全重大疾病医疗保险和救助制度,提高养老服务专业化水平。通过这些具体的措施来逐步打破制约共同富裕的体制机制障碍,使经济增长的红利真正地转化为大众衣食住行的改善,从根本上体现物质生产对人类生存发展最终的服务导向。

### (二)强化理论武装凝聚大众共识

回应大众的精神价值期待,就要对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途径展开微观层面的重新塑造。理论武装不能脱离大众的生活逻辑,必须抛弃生硬灌输的话语模式。从实践角度来说,依靠现代数字传媒技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形成图文并茂、生动鲜活的微传播产品。针对不同的群体,实行不同的内容供给,以“两个结合”为根本指导,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中国特色、中国方式、中国气派来阐释,将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思想更加深层次的注入亿万人民群众的生活当中,成为日用而不觉的价值共识。还要大力提高公共文化设施的服务效能,把社区文化中心建成弘扬主流价值的实体阵地,举办贴近日常生活的文化活动,潜移默化地培育大众的共同体意识。在网络空间治理方面,要创建敏捷的“堵疏结合”舆论引导机制,准确找到并反驳各种违背历史常识的谬误,给大众营造出干净、清朗的精神家园。构建融通中外、贯通古今的新型话语体系,把科学理论变成大众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武器,从而在多元价值碰撞中奠定思想认同的基础。

### (三)推进制度创新优化社会治理

打破基层治理瓶颈的根本办法就是依靠制度革新把民主权利真正落实到基层。从顶层设计角度来讲,要继续推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完善,拓宽基层群众参与立法建言的渠道,保证公共政策的制定可以准确地反映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在微观治理场域中,要大力培育社区自治组织和社会工作机构,创建起社区议事会、居民听证会等常态化的协商平台,把矛盾化解的端口前移。基层民主协商机制可以很好地调动居民参与公共空间治理的积极性。用数字技术对政务流程进行再造,创建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消除部门间的数据壁垒,实现群众办事事项跨区域通办,进而提高行政效率和服务质量。建立群众诉求快速响应机制,对网络理政平台的各类反馈实施大数据分析,准确找到民生痛点。依靠法治、德治和自治三者之间的有机整合,形成起政府管理和社会调节互相促进的治理网络,使大众在日常生活中的一点一滴中体会到当家作主的制度红利,建立起社会和谐稳定长效运行的机制。

马克思主义人民立场在当代社会的生动实践,就是理论逻辑和现实逻辑相统一的必然表现。在复杂的时局之下坚持以人为核心的价值取向,是实现社会结构整体改善的根本动力。把大众的发展诉求、精神期待和制度需求变成夯实物质根基、凝聚思想认同、革新治理方式的实际操作途径,就成为推动社会前进的动力。该过程不断加深,会给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提供一个坚不可摧的物质基础和制度保障。

(作者单位:北京外国语学院)

# 论“明大德”重要论述的马克思主义道德观根源

倪汉宁

信念的社会风气。

在马克思主义伦理观视域下,“大德”包含多样道德元素,体现为对人民的忠诚、对祖国的奉献、对真理的坚守的精神境界,这是区别于其他伦理流派的根本标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明大德”的论述虽借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典籍,但其精神内核深植于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根源在于马克思主义道德观。本文从马克思主义伦理观、历史唯物主义道德观、共产主义道德观三个核心维度,综述“明大德”重要论述的思想根源。

## 一、“明大德”的马克思主义伦理观基础

“明大德”是马克思主义伦理观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具体体现,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对共产党人的必然要求,也是马克思主义伦理观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产物,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观。

该伦理观以辩证唯物主义为基础,是服务于无产阶级与全人类解放的科学道德学说,它批判继承既往伦理学成果,基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准确把握“伦理”在人类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形成了以社会关系为基础的系统伦理观。与自发形成的朴素道德观不同,它立足无产阶级立场,契合社会矛盾运动,是在批判资产阶级形而上学道德观的基础上建立的,戳穿了资产阶级伦理观对劳动人民的蛊惑,将无产阶级团结在人类解放的旗帜下。

中国人民选择社会主义道路,必然选择马克思主义伦理观作为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明大德”借用传统话语,却有着鲜明的时代内涵,其核心是借中国话语阐述科学社会主义之理,贯彻马克思主义伦理观的基本原则。作为“至大之德”,要求人们超越时空局限,以自觉的价值观建构,彰显利他精神与人类解放的价值追求,形成崇尚奉献、坚定

信念的社会风气。在马克思主义伦理观视域下,“大德”包含多样道德元素,体现为对人民的忠诚、对祖国的奉献、对真理的坚守的精神境界,这是区别于其他伦理流派的根本标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领导干部要在大大非面前旗帜鲜明,这是新时代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伦理观的丰富发展,与马恩“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号召、列宁对党性“德性”的阐释、毛泽东“为人民服务”的理念一脉相承,彰显了马克思主义伦理观的真理力量。

历史唯物主义道德观包含两方面:一是无产阶级道德观必须适应并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二是必须代表社会进步和人类自由解放的方向。它颠覆了传统伦理学的主体思路,将道德批判建立在经济社会批判之上,批判压抑人类个性自由的异化劳动和社会关系,重塑被畸形利益关系解构的社会秩序。马克思主义者批判的不是道德本身,而是特定时代道德的社会基础,从人类社会共性中归纳道德基本特征,实现道德本身的解放。

“明大德”绝非形而上学的“圣徒”道德,而是服务于无产阶级历史实践、能实现个体社会价值的现实道德,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明大德”为脱贫攻坚等事业提供精神动力,凝聚起全社会团结的力量,推动社会向共同富裕

的认知,参与行为多表现为被动配合,不同群体的参与度呈现出一定差异;传统参与模式对不同群体的治理需求适配性不足,基层治理场景中的居民参与渠道仍需进一步拓宽。部分居民对社区治理相关知识储备有限,理性诉求表达与协商参与的能力仍有提升空间,参与效能未能充分发挥;激励反馈机制仍需健全,缺乏有效的认可与保障措施,居民参与热情的长效维系仍需进一步完善。

在城市化进程中,社区居民构成日趋多元,邻里间日常互动频次下降、关系愈发松散,部分居民对社区的情感归属感不足,主动参与社区事务的内在动力有所欠缺。部分社区行政化特征较为突出,对居民的主体地位重视不足,参与渠道不够畅通,激励措施与反馈机制尚不完善,难以形成双向互动的良好态势。针对居民参与的引导与能力培育工作仍有提升空间,“共建共治”理念尚未完全融入实践,部分居民虽有参与意愿,却缺乏相应的参与方法与能力,进而影响参与效果。这一现象的出现,是城市发展、社区结构与机制建设等多重因素交织作用下,发展进程中呈现的阶段性表现。

面对阶段性治理困境,各地基层社区积极探索破解路径,将党建作为核心纽带,强

# 城市社区治理中居民参与困境的研究与分析

蒙华

化基层党建战斗堡垒效能,推动党员下沉网格包联楼栋,主动牵头处理邻里协调、环境整治等日常治理事务,带动辖区群众参与社区共建共享。社区依托各类参与载体,结合老年人便捷办事、青年人灵活参与、特殊群体精准帮扶的差异化需求,打破传统治理的时空约束,为居民参与搭建便捷通道。针对居民参与能力不足的问题,开展针对性赋能工作,通过系统引导与专项培训,挖掘辖区内有专业特长、热心公益的能人资源,优化参与质量。同时建立激励与反馈闭环机制,兼顾精神表彰与基础保障,持续激活居民参与治理的内生动力。

城市社区治理中居民参与的阶段性困境并非不可突破,存在切实可行的实践路径。以党建引领为核心,搭建多元居民参与载体,同步强化赋能与激励保障机制,可有效激活居民参与的内生动力,破解参与过程中的实际难题。社区作为居民共同生活的共同体,居民参与承载着权利与责任双重内涵,点滴参与皆能为社区治理注入温情与力量,各方协同发力,让城市治理“最后一公里”充盈温情与活力,逐步形成“人人参与、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共建共治共享格局。

(作者单位:中共建始县委党校)

# 人工智能驱动干部教育模式创新

高雅泽

兴产业培育、乡村振兴等复杂现实任务时,常显乏力。其主要问题体现在:一是培训内容上下一股粗,未能精准区分不同层级、不同领域干部的差异化需求,存在大水漫灌现象;二是教学方式创新不足,线上学习互动性、沉浸感弱,理论与实践结合不足;三是学习成果难以科学量化并与干部的实际工作表现、选拔任用有效挂钩,影响了干部参训的内生动力。这些痛点、堵点,正是人工智能技术可以精准发力、大有作为的突破口。

探索实践路径,推动模式创新。面向“十五五”发展新任务,应积极探索以人工智能驱动干部教育模式创新的可行路径,使其更好地服务于高质量发展大局。

一是深化课程设计针对性。凭借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给每位干部创建专属的学习档案,精确找出他们的知识不足、能力欠缺之处,按照干部培训的重点,发送定制化的学习资料,做到千人千课,向基层干部推荐乡村振兴、基层治理等内容;给领导干部推送战略思维、决策能力等方面的课程,使得教育内容同岗位需求紧密关联。

二是构建沉浸式教学模式。引入虚拟仿真(VR)、增强现实(AR)等智能技术,构建高度还原的虚拟实践场景。干部可以在其中模拟应对重大突发事件、推进复杂项目建设、进行现场舆情回应等,在近乎真实的实战中锤炼决策能力、积累应变经验,有效

迈进,彰显了马克思主义道德观的发展方向。

## 三、“明大德”的共产主义道德观逻辑

共产主义社会是马克思主义最崇高的社会理想,其经济基础必然孕育出基于自由与解放的新型道德价值。由于上层建筑具有相对独立性,服务于共产主义事业的道德,会先于共产主义社会在先进生产关系中产生。

列宁首次提出“共产主义道德”,指出其基础是“为巩固和完成共产主义事业而斗争”,这与共产党人的“大德”高度契合。共产主义道德的社会基础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实现程度,诞生于工业化大生产下的劳动阶级联合与公有制生产,因此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求全党“明大德”。

马克思强调,共产主义社会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但这需要物质资料极大丰富作为基础。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弘扬共产主义道德,关键在于建设一支以马克思主义武装、具有共产主义道德的先锋队。列宁提出“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道德原则,我国则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塑造人民公仆形象,形成劳动伟大、奉献光荣的社会风气,这正是总书记要求“明大德”的深刻考量。

毛泽东同志指出,上层建筑的变革往往先于生产力的发展。在共产主义尚未实现的当下,贯彻共产主义道德看似存在矛盾,实则是新时代共产党人的责任与担当。共产党员需坚定践行共产主义道德,引领群众摒弃个人主义,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凝聚力量,推动物质文明建设,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筑牢思想基础。雷锋精神所彰显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品质,正是共产主义道德的生动体现,也是“明大德”的实践典范。

(作者单位:江西师范大学)